

## 强、弱关系及其群的规模对小组贷款的还款率的影响

### ——基于安徽某社区的社会网络分布的分析<sup>1</sup>

苟天来<sup>2</sup> 左停<sup>3</sup> 徐秀丽<sup>4</sup>

**摘要：**小额信贷中小组贷款取得的成功使之在世界风靡。一般认为其成功的几个显著的原因是跟自愿选择组成小组、成员压力机制、社会关系、社会惩罚、群的大小和同质性等因素相关。本研究通过安徽霍山地区一山村的强弱关系及其群的分析发现：自然村中强关系的群的规模大概集中在3户，并不满足一般小组贷款要求的规模；弱关系形成的群的规模在5户以上，基本上满足要求的小组规模；然而弱关系相对于强关系而言承载的资源不重要，因此其可能产生的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都相对较弱；按相关机构数量要求组成的信贷小组必定存在强弱关系的组合，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威胁的实现很大可能只来自于部分小组成员，同时成员数量规模超过了强关系群的临界点则可能不存在数量上的意义；另外，群的大小履行的则是交易成本和集体行动等功能，而非成员压力机制的来源。

**关键词：**强关系；弱关系；群；小组贷款；小额信贷

#### 一、问题的提出

实施小额信贷之前，农村信贷中普遍存在如何将信贷面向穷人而又要保证高偿还率的问题：一方面因为穷人没有足够的担保，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地方比较偏远、监控成本也较高。小额信贷机制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认为，高偿还率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基本特征和成功标志之一，小额信贷的偿还率普遍都在95%以上(Stallings, 1999)，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小组贷款(Solidarity Lending 或者 Group Lending)。最著名实践算是孟加拉国的格拉敏银行。格拉敏银行起源于1970年代由默罕默德·尤努斯教授领导开展的一个行动研究方案，该方案向孟加拉国村庄里的贫困家庭提供小额贷款，并主要以四人或者五人的小组实施小组贷款(Zaman, 2004)。截至2008年2月，格拉敏银行的分支机构增加至近2500个，为孟加拉国80000多个村庄的745多万借贷者服务(Grameen, 2008)。在中国模拟该模式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也取得了成功，在河北省易县、河南省虞城进行了试点中，易县扶贫社1994年5月至1995年11月的一年期贷款的还款率在99%以上，虞城扶贫社的还款率为100%(汤敏和姚先斌, 1996)。

小组贷款或者小组贷款取得成功的原因方面的研究大概是在小额信贷的诸多研究分析中最为普遍的(Morduch, 2000; Ghatak, 1999)，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Besley 和 Coate (1995) 通过战略偿还博弈分析表明联保能够更有效地刺激还款。Stiglitz (1990) 和 Varian (1990) 的研究表明小组贷款取得的成功是因为同辈群体的监控更为有效，

---

<sup>1</sup> 本论文由“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09 年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强、弱关系及其群的规模对小组贷款的还款率的影响——基于安徽某社区的社会网络分布的分析》修改而成。

<sup>2</sup> 苟天来，北京农学院城乡发展学院讲师。

<sup>3</sup> 左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

<sup>4</sup>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他们能够监控的成本更低,比银行更了解借钱的人;同时,这也能够有效地解决不还款的道德风险问题。另外一方面,在联保机制中成员的选择机制、成员压力机制、以及成员的同质性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是促进小额信贷高偿还率的重要原因(Huppi等,1990;Godquin,2004)。Wydick(1996;1999)的研究表明对不还款的群体成员要有足够强的社会惩罚的威胁时才能够产生纳什均衡,通过成员的监控,借贷群体一方面可以帮助那些不能够还款的人,另一方面起到可以将对那些未还款的人起着将被逐出群体的威慑作用,不还款的道德风险也能够得到削弱。一些研究通过二人博弈模型来分析发现,联保中的顺序贷款的机制也会有效地加强小组贷款的还款率,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加强监控,解决道德风险问题(Chowdhury,2005)。

然而富有争议的是与社会资本或者社会关系等相关的因素在联保中对还款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关于社会关系强弱对还款的影响的争论。Wydick(1999)通过对Guatemala的研究,社会关系对提高还款率仅有很小程度的影响;反而一旦存在即使不还也不会将他们逐出群体的规则时,社会关系就不会成为还款的动力。这一结果也得到Bastelaer和Leathers(2002)在赞比亚、Ahlin和泰国方面研究的印证。Bastelaer(2006)对种子借贷小组的研究也表明类似的观点,在同一个教区的成员则对偿还率反而还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成员间非常强的关系并非会对偿还有积极影响。然而Zeller(1998)的研究则表明有高凝聚力的Madagascar群体有明显的高的偿还率,不还款不仅是给他们在朋友和亲其中带来名誉的损失,而且还会减少他们在非正式社会安全网方面的获得性。Karlán(2007)的研究也表明社会连接越多的个体彼此更信任,同时也更珍视他们之间的关系;社会连接能够帮助人区分谁是真的遇到了问题不还钱,谁是真的赖账,真正遇到问题没办法不还的人能够被原谅,而且还能够再借钱;同时社会关系还能够带来有效的监控,并且能够及时地知道彼此的不还的情况和原因,如果真是食言也会通过断绝关系来惩罚。

群体大小也被视为另外一个影响还款率的重要因素。群体成员的数量在很多地方不尽相同。Grameen银行采用4、5人一组组成小组(Zaman,2004);玻利维亚的Bancoso则采用4-7个成员(Bastelaer,2006);中国宁夏盐池地区实施的小组贷款小组人数为5-6个;“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所实施的小额信贷机制以6-8人为一个联保小组(赵俊臣,2007)。Mosley和Dahal(1985)的研究表明,在尼泊尔开展的小额信贷,当成员超过20人的时候互信程度就降低了。Zeller(1998)在Madagascar的四个区域开展抽样调查,调查群体成员的平均数量大约是10个,研究发现,虽然该地区群体规模比其他调查地区的大,但是还款率仍然不错;需要注意的是群体变大到超过可以管理的程度后,后会增加协调的难度,增大道德风险和搭便车的问题;适当的群体大小应该跟当地的社会经济、农业条件相关。Bastelaer(2006)在对种子借贷小组的研究中发现,群体成员数量的大小(12个或者更小)对还款的影响相当显著,越小的群体表现得更好,这样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得到其他成员的种子使用信息。

上面的综述表明在诸多的小额信贷的小组贷款中到底群以多大合适可能没有普遍的模

式；群成员的社会关系的强度可能会影响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社会惩罚力度，由此影响信贷的还款绩效。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是个人主体网的大小是否能够满足现在小组贷款所要求的人的规模；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彼此都有直接关系的群满足小组贷款对群的规模的要求。群的量的特征对群表现的影响在很早就有论述。齐美尔在很早以前就关注社会互动中的“量化”的元素和形式化特征，他认为成员的纯粹数目是群体最抽象的特征之一，它作为一种结构形式对群体的性质和成员交往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齐美尔，2002：271）。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的整合功能（Granovetter, 1985），在对求职影响、堕胎、吸毒等方面都有诸多研究。

从笔者调查的安徽霍山、宁夏盐池、云南南涧等地的小组贷款案例来看，其规模在4-8名之间，这一现象拟出一个假设，即是群的大小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以及其对信贷还款绩效的影响在中国农村中的小组贷款中是如何表现的？这在诸多有关的实践中并未看到理论支撑，同时也缺乏相关的研究。由此，本研究尝试以2004年在安徽霍山某个山区自然村开展的社交网络分布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关系强度的主体网大小及群的规模的分析来探索农村社区中强、弱关系及其形成的群和小组对信贷还款率的影响。

## 二、研究方法

为了明确以上问题，研究，来探索目前中国小组贷款中关于群的大小和社会关系可能存在的基础。本研究遵循以下思路。第一，选择社区整体作为并区分出农户关系强度的类型。第二，检测不同关系强度的主体网大小。第三，通过社交网络分析中步长为1的派系分析来检测可能存在的群和群的大小。第四，对比现有的群的大小和关系强度对绩效的影响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明确以下内容。

### （一）测量指标

本研究以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来对强弱关系进行测量。在笔者在霍山山村的实际调查中，这在村民的视角下反应为“关系好的”、“一般的”、“见面打个招呼的”以及“不打招呼的”。在西方关于强弱关系的研究中，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研究者将人与人的关系按三种类型进行划分：强关系（strong-ties）、弱关系（weak-ties）和缺失状态（absent）；“熟人”（acceptances）关系在其中被视为弱关系——“our acquaintances (weak ties) are .....”，其中他将点头之交归入了缺失状态的关系中（Granovetter, 1983）。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仔细考究，中国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所讲的“熟人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强度和西方社会关于强弱关系研究中的“熟人”（acceptances）关系强度是有所区别的。费孝通最初是将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二分而谈；延续下来的讨论和研究大体也是如此，用熟人信任和陌生人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来讨论中国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特点。在相关的翻译中，有很多文献将熟人社会翻译为“acceptances society”。对比二者的差异可以看出，强弱关系的研究中“acceptances”是按照三分法划分出来的，“absent”的含义更接近“陌生”关系，“strong-ties”应该等同于“熟人”关系中的一部分。

由此本研究开始对强关系和弱关系分别进行测量。测量内容为主体网的大小以及步长为

1 的群体的规模。其中涉及到的概念有点的连结度和派系。点的连结度是指某一点的连接度是该点连接线的数目 (Hanneman, 2001: 61)。派系分析的分析对象是存在的彼此直接连结的子群。早期的社会学家有群体的直观概念而且靠这些直觉去理解一个群体很容易,但是一旦要回答什么样的个体属于或者不属于一个群体时,直觉做不到;派系分析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Freeman, 1996)。在测量中本研究使用乐 Ucinet 软件来分别进行分析,派系分析选择 N-Cliques 分析。

分析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个体的主体网和群来分析还是以家庭的主体网和群来分析。对此,为了对应小额信贷是以户为单位来开展联保的问题,所以本研究也以户的关系来对此进行分析。在调查中,则首先调查个体的主体网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按照户为单位进行合并,并对此进行分析。

## (二) 资料收集方法

要了解自然村中可能存在的群的大小,则不得不采用整体抽样。为此本研究采用普查法来搜集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信息。普查法需要收集每个行动者的连接信息,为了完成以上工作,研究者通过在村中的 25 天观察以及半结构访谈来收集资料,并在对相关信息进行了结构化整理后展开统计分析。该调查于 2004 年 8 月进行,调查地点选择了安徽霍山县 B 自然村,该村为当地的一个生产队,地属山地,距所属镇约 10 公里,距县城约 30 公里。村居民沿流域居住,居住区长度在 1 里左右。该村共有 22 户居民,共 89 人,其中有 68 位成年村民,其余的是儿童或在校学生。在 68 位成年村民中,有 19 位已经长期外出打工的村民,为了更清楚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村庄生活的成员的交往网络,所以本研究把长期外出打工的村民剔除在外,选择了在村中长期生活的余下 49 位村民作为调查对象。本研究共调查了 38 位村民,其余 11 位村民的交往关系信息是通过对这 38 位村民的间接访谈以及通过研究者对村民日常交往的观察获得。

在调查关系强度的过程中,但是问关系好坏也会遇到诸多障碍,因为涉及到关系总是村民的私人秘密。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具体的调查中,研究者从 2003 年即在该调查一段时间,并在 2004 年调查的过程中进一步与村民建立信任关系,而且为了避免了给村民带来顾虑,研究者尽力避免边访问边记录和讨论结构化的问题。调查中也采用了诸多指标对村民的强弱关系判断进行印证,这些指标包括与被调查在一起的闲暇时间总量、信息交流的内容、生产活动中的互助和共管情况。客观地讲,对关系强弱的判断还要涉及到这四个维度的权重,然而最终研究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即:以这四个维度为参照,由村民自己来衡量哪些村民跟他关系好,哪些跟他关系一般,哪些跟他没有关系。比如,C 一个月中与 A 在一起的最多次数为 2 次,最长时间为 40 分钟;而 C 与 B 在一起的最多次数为 5 次,最长时间为 1 个小时;那么是否可以说 B 和 C 的关系强度大于 A 和 C 的关系强度?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该研究中,如果 B 认为 C 是“合的来的或者说关系好的”人,那么就认为 C 是强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调查的闲暇时间总量、信息交流的内容以及生产活动中的互助和共管情况仅为帮助研究者和村民确认关系类型的参照和达成研究者和村民之间研究信任的重要

工具。

调查还借鉴了网络分析中研究资源多样性的办法——将网络中的资源流分为三种一般的类型，既物质流、符号流和情感流（特纳，2001:202），另外还参考了已有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一个社区中进行社会网络调查的问卷（Schweizer 等，1998）以及通过点出度和点入度的比较来提高信度和校度的分析（Scott 等，2002）。同时，为了进一步贴合并全面地把握当地的实际生产和生活情况，本研究在调查的开始还通过利用参与式研究工具中的季节历和每日活动图来细分村民一年四季与每日的活动情况，由此根据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来调查村民在每项活动中与其他村民的交往情况，并由此来判断村民之间在一起的闲暇时间总量、信息交流的内容、生产活动中的互助和共管情况。

### 三、研究发现

#### （一）强关系和弱关系承载的资源

研究者通过 25 天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在村民的视角下，强关系是指，在一起能够聊得来，交流的时间长，但交往频次可能根据空闲时间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弱关系是关系一般，交流时间也短，甚至一月都没有，见面多表现为礼貌的问候或者开几句玩笑，有时候他们会交流一些信息，但这些信息对生产和生活来说不重要，同时也会因为信任问题而难以判断对方所谈信息的真假。结合农户日常生活和生产的诸多活动<sup>5</sup>来看，强交往关系和弱交往关系最本质的差别是所传播的信息等资源的特征不同，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交往频次、交谈的时间长度以及传播的信息和资源对对方或者自己的重要性。在这 25 天内彼此有强关系的人深入交流频次最多的能够达到 6 次，最少的有 1、2 次，每次交往时间大概超过半个小时，所谈内容包括各种信息交流，最突出的特征是强关系成员交流的一些信息是不愿意用来和弱交往关系的人交流的，如：自己的生活和生产计划、有价值的生产和生活信息（主要表现为打工信息、和过去的从事编织和炒茶的核心技术）以及评论其他人的闲话。有强关系的村民之间在水稻生产中有更多的互助活动；在借钱上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当地村民认为这个数字一般是两、三百元以上）；彼此之间可能有共同使用一些有价值的工具，如喷雾器、耕牛。彼此有弱关系的人则在见面的时候会礼貌地寒暄、开些玩笑，然后各自走开忙着自己要做的事情；交往次数根据碰面的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都缺乏深入的交流；借钱上一般能借几元、几十元；互助活动较少；偶尔会交流一些生产信息，但多属于透露这些信息后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强关系的人不会造成损失。有些村民之间发生过直接交往，但只是见面招呼一下，没有实质性的信息传播，本研究将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根据这些物质流、信息流和情感流所依赖的强弱关系不同，大概可以将它们按照以下类型进行粗略分类，见表 1。其中下表中的排他性是指传播者能够控制资源的程度，如果某些信息控制起来容易，那么排他性就高；反之就低。

---

<sup>5</sup> 通过在实地对季节活动和对每日活动的调查发现，这些活动涉及到的主要关系为农业技术信息的邻里传播关系、茶信息的邻里传播关系、非农职业信息的邻里传播关系；插秧、收稻和盖房子以及结婚、生子、新房上梁和丧事仪式等活动上发生的互助关系；共同拥有和使用生产工具、共同修缮道路、以及管理自然村的共同财产发生的关系；以及在闲聊、娱乐当中生活信息传播及邻里日常交往关系。

表 1 强弱关系所承载的资源差异

承载的资源类型	强关系	弱关系
拥有高排他性的有价值的信息	多	少
弱排他性的有价值的信息	多	多
没有价值的信息	多	多
一起交流的时间	长	短
借款的金额	大约上百元	大约 100 元之内
生产劳动互助	多	少
共用有价值的生产工具	多	少

## (二) 强关系及其群的可能大小

从表 2 来看, 农户交往的强关系中, 点的连接度数量在 0-9 之间, 也就是说这些村民拥有的关系好的对象的个数最少为 0 个, 最多为 9 个。点的连接度的均值为 3.81 个,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村民拥有接近 4 户的强关系交往对象。其中 0、1、2、3、4、5、6、7 和 9 在 21 户彼此的交往中分别占到 9.52%、4.76%、14.29%、14.29%、19.05%、19.05%、9.52%、4.76%、和 4.76%, 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户拥有的好友个数主要集中在 3-5 户之间, 比例约占 66.67%。占可能的最大的连结度的百分比指的是某个主体网的点的连结度大小与该主体网的点的连结度的可能最大值的比例, 在该强关系网络中, 农户点的连结度的最大值为 42.86%。

表 2 强关系主体网中点的连结度

点的连接度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点的连接度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0	0.00%	2	9.52%	5	23.81%	4	19.05%
1	4.76%	1	4.76%	6	28.57%	2	9.52%
2	9.52%	3	14.29%	7	33.33%	1	4.76%
3	14.29%	3	14.29%	9	42.86%	1	4.76%
4	19.05%	4	19.05%				
均值				3.81	18.14%		
合计						21	100.0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即使主体网的最大连结度也才为 42.86%, 点的连接度的均值为 3.81,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百分比为 18.14%, 这表明农户的强关系并未遍布在整个社区。大部分农户拥有的好友家庭的个数为 3-5 户, 同时还有在强关系网络中孤立的两户人存在, 即他们没有与周围的村民发生强关系, 这些表明农户在农村社区强关系的网络并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依靠强关系来实现接贷高还款率的解释有矛盾之处。因为这里存在以这么大的规模是否能够组成小组贷款所要求的群的规模。

承接以上疑问, 研究者继续对可能组成的群进行分析。通过步长为 1 的派系分析发现, 其可能存在的 2 人以及 2 人以上的群的数量共为 21 个, 另外有两个为孤立的农户。其中 21 个群中包含成员个数为 4 的群体有 1 个, 成员个数为 3 的群体有 16 个, 成员个数为 2 的群体有 4 个。所以孤立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也并没有组入任何一个群内。从中可以看出, 群

的数量最大值为 4, 但仅 1 名, 大部分群的成员数量为 3。在 21 个群体中, 成员个数为 4、3 和 2 的群体所占比例分别为 4.76%、76.19% 和 19.05%。

**表 3 强关系群的分布情况**

1: DEO	7: DEGN	13: HI	19: ABC
2: DFO	8: GNP	14: JKS	20: QR
3: BCO	9: GNR	15: KMS	21: DS
4: EHO	10: EGH	16: HK	22: L
5: OPQ	11: GPU	17: DFN	23: T
6: OPU	12: GRU	18: FNR	

通过强关系中可能存在的群的分析发现, 村民可能能够自愿组成的群的规模大部分仅为 3 人。与诸多实践所要求的相比较, 这个数量小于 Grameen 银行的规模, 也小于在中国实践的诸多小额信贷的小组人数, 如宁夏盐池、云南 YUEP 项目以及安徽霍山等的小组人数。这表明, 单以强关系及其可能形成的群体大小尚不能解释成员监督和群体压力或者可能面临的社会惩罚。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推广, 那么其表明一种可能: 在已有的自愿选择成员组成的诸多小额信贷中, 并非每个成员之间都有强关系, 之间必定存在弱关系。

**(三) 弱关系及其群的可能大小**

从表 4 来看, 农户弱关系主体网中, 点的连接度数量在 5-18 之间, 也就是说这些村民拥有的关系好的对象的个数最少为 5 个, 最多为 18 个。点的连接度的均值为 11.08 个,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村民拥有接近 11 户的弱关系交往对象。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户拥有的好友个数主要集中在 14-16 户之间, 比例约占 57.14%, 这部分农户的主体网占可能的最大连结在 66.67%到 76.19%之间, 基本上覆盖了社区的大部分成员。

**表 4 弱关系主体网中点的连接度**

点的连接度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点的连接度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5	23.81%	1	4.76%	14	66.67%	5	23.81%
8	38.10%	1	4.76%	15	71.43%	3	14.29%
10	47.62%	2	9.52%	16	76.19%	4	19.05%
11	52.38%	1	4.76%	17	80.95%	1	4.76%
13	61.90%	2	9.52%	18	85.71%	1	4.76%
均值				11.08	56.19%		
合计						21	100.00%

弱关系的点的连接度均值为 11.8,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的百分比为 56.19%, 相对于强关系而言, 其覆盖面表现更广。大部分农户拥有的点的连接度都在 10 户以上, 仅有两户拥有的点的连接度较小, 分别为 5 户和 8 户。这种情况为形成一种彼此都有弱关系的小组提供了可能。

进一步通过对其可能形成的群的分析发现,弱关系可能能够组成的群的数量为 69 个,在弱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个体,群规模的最小值为 4 户,最大值为 8 户。由于篇幅,本处省略了弱关系群的分布情况,仅将其规模出现的频次统计列出,见表 5。大部分群的规模集中在 6 户和 8 户。

表 5 弱关系群的大小分布

群的大小	4	5	6	7	8	合计
频次	5	7	26	9	22	69
百分比	7.25%	10.14%	37.68%	13.04%	31.88%	100.00%

表 5 表明,诸多小额信贷中所形成的小组规模大致在这个范围之内。至少,比较流行的 Grameen 银行的 4-5 户左右形成的小组大致是在这个规模内。笔者在中国发现的实施小额信贷的贷款成员规模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内。在此,结合强关系分析中认为在组成的群中必定有弱关系存在的推论在此进一步得到证实。同时也表明,即使通过弱关系来组成小规模的小组,其形成还是基本可能的。然而这仍然留下一些疑问,对于一些大群体组成的信贷小组而言,弱关系的群的大小仍然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如霍山地区 20 户左右的自然村组成的社区共同基金使用群体。

#### (四) 强弱混合关系及其群的大小

还有一种可能是组成的群所构成的关系包括强弱关系。将强弱关系数据按定类变量合并后发现,农户的网络明显扩大,见表 6。主体网的点的连接度为 8 到 19 之间,点的连接度均值为 14.33,占可能的最大的连接度的百分比为 68.42%。超过 50%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农户为 20 个。这些表明如果考虑到强弱关系对形成群体的可能影响,那么群体的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

表 6 强弱关系主体网的点的连接度分布

点的连接度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		点的连接度	占可能的最大连接度的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8	1	4.76%	16	4	19.05%
12	1	4.76%	17	4	19.05%
13	3	14.29%	18	4	19.05%
14	1	4.76%	19	1	4.76%
15	2	9.52%			
均值			14.33		68.24%
合计				21	100.00%

进一步通过对强弱关系可能组成的群的派系分析发现,在考虑到强弱关系后,该社区的群明显表现出 3 个可能的派系。3 个可能派系的户数分别为 19、19 和 9 户。如果联系到小组贷款的群的自由选择组成,那么在小于 9 名成员的群的组成要求中,就可能使所有群都形成彼此都有关系的群。这个结论为诸多想要形成较大的成员彼此有直接关系的较大群体的小组贷款形式提供了可能的证据。同时也表明,除非同时存在强弱关系的支撑,否则不能够形成较大的彼此都有直接关系的群体。

### (五) 成员监督、社会惩罚和强弱关系

以上关于群的大小与强弱关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想通过强关系来形成目前所要求的群体规模(一般在4户以上)明显不太可能。可以断定目前在中国实施的4-8户左右的信贷小组规模中,成员之间不可能人人都具有彼此密切的强关系,中间必定有弱关系。结合上面第一部分有关强关系和弱关系所承载的资源差异概括(见表1),可以看出强关系和弱关系可能带来的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也会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强关系比弱关系承载的资源更有价值、更重要。从调查到的资源传播现象发现,只有在弱排他性的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和没有价值的信息传播方面,依靠强关系传播和依靠弱关系传播的区别不太大。而在传播拥有高排他性的有价值的信息、生产劳动中的互助活动以及共用有价值的生产工具方面,依靠强关系发生的可能比弱关系更大;强关系成员之间一起交流的时间也要比弱关系成员之间交流的时间长;在日常生活中的邻里借贷方面,强关系之间的村民一般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在当时调查的数据表明强关系的村民能够通常能够提供上百元的借贷,而弱关系的则通常只能借几元、几十元。

从强关系承载资源的方式可以看出强关系成员之间由于其有更多地交流的时间、更多的信息交流,所以其成员监督可能比弱关系的更为有效;然而强关系的监督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在小组信贷要求的群的规模一般都大于强关系可能组成的群的规模,那么必定存在相应的农户并不会受到所有的成员在强关系机制下被监督。事实上还可以从强关系承载更大数量的民间借贷可以看出,强关系村民之间对对方的信任期望也比弱关系村民之间的要高。这也决定了村民在选择借贷小组成员组成时可能倾向于强关系的成员。就可能发生的社会惩罚而言,如果某个成员因为不还款而造成强关系的断裂,那么这将给他带来诸多重要资源承载网络的损失。这的确也将是农户生计发展的社会资本的损失。这种损失对农户的影响较大,因为强关系主体网的点的连接度的平均规模仅为3.81户,可见数量少,可选择性小;尤其是对于那些仅拥有少量朋友的农户来说,失去了这些朋友,将直接对他们在社区获得信息以及互助的各种资源产生不利影响。

从弱关系承载一些没有价值的信息和排他性不高的有价值的信息来看,弱关系下可能产生的成员监督也未必会很强。同时这也表明弱关系村民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对方,这势必影响到小额信贷实施过程中村民自愿选择组成小组的过程——存在不愿意选择弱关系农户的可能。有弱关系的农户,对另外一方的信用期望也比较低,所借出钱的时候也只是少量借出;即使借钱的人不还,损失也不会太大。弱关系承载的其他方面的资源的价值在实际生活中也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小额信贷中的不还款遭到断裂关系的社会惩罚考虑,弱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直接的社会惩罚也不会太大。

以上分析表明了小额信贷机构对群的大小的要求与强弱关系之间的矛盾。强关系及其群的大小、弱关系及其群的大小以及强弱混合关系及其群的大小表明了,如果要形成现在在中国实施的小额信贷群的规模(笔者调查所见的一般比较流行在5-8个成员),只可能是在弱关系的群或者强弱混合关系的群才可能符合这种规模。在一些大群中,如霍山某些20户

共同使用的共同基金小组，只有强弱混合关系产生的群才符合这种规模。进一步的通过强弱关系承载的资源类型来考察强、弱关系中社会惩罚和成员监督情况发现，弱关系相对于强关系而言其传播的信息重要性都较低，其监督作用显然也会较弱；其承载的其它资源的重要性也较低，不还款带来的直接关系的断裂产生的社会惩罚也因此不会太大。另外弱关系村民对彼此之间借贷行为的信任期望也较低。弱关系这些有关社会惩罚和社会监督较弱的特点引出的问题是，既然较弱为什么还能够在村民的自愿选择下组成相应的借贷群，并产生高的还款率。

####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对自然村中强弱关系及其组成的可能的群的大小与小组贷款中群大小的要求分析表明，强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资源有明显的差异；强关系比弱关系能够更好地实现成员监督、资源选择和社会惩罚。

但是自然村中强关系的群的规模大概在 2-4 户之间，主要集中在 3 户，相对来说远不能满足现在小额信贷所普遍要求的贷款小组规模。弱关系形成的群的规模较大，大部分集中在 5 户以上，基本上满足小额信贷普遍要求的贷款小组规模，然而因为弱关系一般承载的资源不重要，其产生的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都可能相对较弱，而难以让人信服贷款小组的还款率与弱关系产生的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有关系。唯一有可能的是贷款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由强关系和弱关系混合组成；而且虽然成员间彼此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强关系，但是可以在成员中找到任何一个人必与另外一个人存在强关系。这种情况下，成员监督的实现和可能的社会惩罚威胁很大可能并非是群体中所有的成员都面临着每一个成员的监督和惩罚威胁，而只是部分强关系成员的监督和可能的社会惩罚。

社会关系的作用在一些研究中的被认为对还款的影响较小，如 Wydick(1999)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不少研究却认为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对还款有积极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强弱关系承载的资源的剖析表明，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有明显的关系。强关系的成员之间往往承载更多的重要的排他性较高的信息，同时彼此之间还有很多互助活动；而弱关系之间仅有不重要的排他性较高的信息和无价值的信息以及少数互助活动。这就决定了强关系成员之间因为了解更多的信息而能够更好地实施成员监督；同时由于其承载的资源重要，所以产生的社会惩罚威胁也更大。在这个层次上说，关系的强度是成员彼此了解和依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已有的研究将社会关系视为独立于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所忽略的地方。

群与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之间的关系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小额信贷的小组贷款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为什么要求组成 5 人小组、6 人小组或者其他人数的小组，小组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与其高的还款率使得小组信贷的操作方式带来的成功变得更为神秘。然而本研究对强、弱关系以及强弱混合关系的点的连结度和所构成的群的分析表明，借贷小组并非都是纯强关系的成员或者弱关系的成员，其组成必定是强弱关系混合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威胁发挥的联保作用的话，那么群的规模就

失去了意义。因为以上分析也表明发生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威胁的最有力的关系还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那么小额信贷的还款压力可能还是来自强关系产生的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群内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与强关系成员发生的压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组贷款的群的大小如果超过强关系组成的群的临界点（该研究表明的临界点大概为3）就可能不再具备群的数量上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的担保形式就与联保但非群体贷款的模式十分相似？然而联保但非群体贷款的实践效果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的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组贷款实现高还款率的原因可能与成员监督、社会惩罚和社会关系之外的其他因素有关系。

在宁夏盐池、安徽霍山、云南 YUEP 项目的调查中，研究中猜测还可能存在别的原因：第一，组成贷款小组的所有成员经济条件一般，对贷款有较大的需求；第二，正是因为在对贷款都有需求的情况下，将他们形成小组后并对他们施以连带责任——若一个不能还上，其他小组成员也不能贷到，使得社会惩罚能够运作；第三，小组中有负责人，这样能够有效地促进小组的集体行动，避免一旦出现不还款的人而没有人组织来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果不是联保的成员也同样有这样的资金需求，那么他可能也就不会关心成员使用基金的情况了。在这些基础上，群的规模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可能只与在实施社会惩罚时促进集体行动时的交易成本相关，而非与成员监督；同时规模一旦超过成员所持强关系的临界点规模的增长也可能与社会惩罚大小具有很小的关联性了；而社会关系则在其中扮演承载成员监督和社会惩罚载体的功能。

#### 参考文献：

- [德]齐美尔. 2002.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林荣远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美]乔纳森.特纳. 001.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 丘泽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汤敏、姚先斌.1996.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 《改革》第4期.
- 赵俊臣. 2007. 《社区村民共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模式创新——以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 Besley, T., Coate, S., 1995. "Group lending, repayment schemes and social collater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6.
- Chowdhury, Prabal Roy. 2005. "Group-lending: Sequential financing, lender monitoring and joint liabi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7.
- Godquin, M. 2004. "Microfinance repayment performance in Bangladesh: How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s of loans by MFIs". *World Development* 32.
- Ghatak, Maitreesh, 1999, "Group Lending, Local Information and Peer Sele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0.
- Grameen Bank. 2008. Introduction. <http://www.grameen-info.org/bank/index.html>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Karlan, D. 2007. "Social Connections and Group Banking." *Economic Journal* forthcoming 117.
- Mosley, P., & Dahal, R. P. 1985. Lending to the poorest: Early lessons from the small farmer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pal.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
- Morduch, J.. 2000. "The microfinance schism", *World Development* 28.
- Schweizer Thomas, Michael Schnegg, and Susanne Berzborn. 1998, "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in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ocial Networks* 20.
- Scott L. Feld, William C. Carter. 2002. Detecting measurement bias in respondent reports of person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24, 365-383.
- Stallings, S.. 1999. "A visible hand",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1(3): 14-16.
- Stiglitz, J.. 1990. "Peer monitoring and credit market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4.
- Varian, H., 1990. "Monitoring agents with other agen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6.
- Bastelaer Van, Thierry Leathers, Howard. 2006. "Trust in Lending: Social Capital and Joint Liability Seed Loans in Southern Zambia".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34.
- Zeller, M. 1998. "Determinants of Repayment Performance in Credit Groups: The Role of Program Design, Intra-Group Risk Pooling, and Social Cohesion in Madagasc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6.
- Zaman, Hassan, 2004. "The Scaling-Up of Microfinance in Bangladesh: Determinants, Impact, and Lesson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